

WENHUAZHEXUECONGSHU

费希特： 行动的呐喊

洪汉鼎 著





文化哲学丛书

洪汉鼎 著

费希特：
行动的呐喊

山东文艺出版社

文化哲学丛书

费希特：行动的呐喊

洪汉鼎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 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125印张 2插页 112千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5329—0116—5
I·103 定价：1.75元

我不愿只是想，我一定要去干。我只有一个激情、只有一个需求，只有一个我自身的完全感觉，这就是去影响我周围的人，我干得愈多，我便愈觉得快乐。

《费希特书信》

我寄望于行动，行动也属于使人类完善的计划之列。站在那里抱怨人类堕落，而不动手去减少它，那是女人的态度。不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变得更好，就进行惩罚和挖苦，那是不友好的态度。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

《论学者的使命》

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

《人的使命》

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意放弃或接受的死用具，反之一个哲学体系因占有这个哲学体系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生气。一个天性萎缩的或是由于精神的奴役、博学的奢侈与虚荣弄得萎缩了和歪曲了的性格，将永远不能把自己提高到观念论的程度。

《知识学第一篇导论》

引　　言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生于1762年，这一年正值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出版，这本书可以看作费希特人生旅途开始的标志。在《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的启发下，费希特后来一直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生活着、思想着和战斗着。当他开始要求公开发言时，法国革命正好达到了高潮，他衷心愿望这场革命能在欧洲取得巨大的优势，导致各个封建国家特别是德国实行某种革命。他死于1814年，这一年正是全欧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自由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死前他作为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积极参加了反拿破仑的战争，临终前听说普鲁士大元帅布吕席越过莱茵河，他带着胜利的喜悦，欣然离开了人世。

这是一个短暂的人生旅途，只有五十二年，然而费希特却留下了他不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而且作为热情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所战斗过和活动过的坚实足迹。

他来到这个世界时，周围的土壤“只不过是一堆粪堆”，一堆正在腐烂和解体的垃圾，“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①他作为一个农

①恩格斯：《德国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633—634页。

村小手工业者的儿子，从小饱受了贫困和饥饿，要不是一次偶然的侥幸事件，他可能终身不得进入大学之门，但即使这样，贫困之神却未离他的左右，“这骨瘦棱棱的保姆一直成为他终身可靠的伴侣”。①他为了求生存，每天都要同面包、衣着，同各种各样的困难进行不断的斗争。但他并没有被艰辛的生活所压倒，更没有为他出身低贱而自卑，对于他出身于平民，他始终保持一种骄傲的意识，正如他所说的：“在德国，人类的一切进步都是来自平民。”②他对贵族王公极端蔑视，认为社会的一切罪恶都来自贵族王公的骄横和腐败，他把他那时代的最典型的特征描述为人们敢于大胆谴责王公大臣，即使他得到魏玛宫廷一位公爵的扶植去耶拿担任教授，他也把他的敬重只说成是“针对他这个人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他的王公大臣身份而言的”。③他决不幻想德国会有一位国王或王公给知识学的作者一笔恩俸，“因为他们将发现知识学的原则不会落入他们的圈套”，“因为，即使有人提供一笔恩俸，他也决不会接受。”④在他临死前一年，当普鲁士国王颁发《告国民诏书》不久，他还写下这样一句话：“除非铲除掉各个封建王公，否则德意志民族便根本不能诞生。”⑤

他也要为自己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而感到幸运，因为正是这样一个腐烂的时代，在邻近的法国爆发了一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向人类描绘了一幅“关于人权与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画面”，⑥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腐烂的

①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20页。

②《费希特著作集》，梅迪库斯编，德文版第1卷，第1页。

③《费希特书信选》，布尔编，1961年德文版，第92页。

④同上书，第112页。

⑤《费希特全集》I·H·费希特编，1971年德文重印版，第4卷第414—415页。

⑥《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39页。

时代，在他的祖国即德国的哲学是产生了一场伟大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正是由于这场哲学革命，人的意识或理性不再是以前那样象太阳围绕着现象世界旋转，而是现象世界围绕着人的意识或理性旋转。理性一下子登上了人类历史的皇帝宝座。实践的革命和精神的革命使费希特在他的人生旅途中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职责和神圣的使命，他要以法国革命所唤醒的精神发挥康德哲学的实践理性学说。

在他初次登上哲学舞台不久，他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德国文化的最前列，以致费里德里希·施雷格尔这位浪漫派的文艺批评家把他的《知识学》与法国革命、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相提并论，认为它们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倾向”。初看起来，这种联系似乎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威廉·迈斯特》看作是德国文学中古典人道主义的代表作，而把费希特的《知识学》理解为那场广泛的唯心辩证法思想的整个运动（这个运动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两部著作在精神上却是能与政治实践上的法国革命相媲美的。在费希特的《知识学》里，法国革命那种勇于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最高的体现，他的“自我”就是法国革命所唤醒的对现存一切实行变革的火一般的行动渴望。费希特曾经断言，法国民族已经通过革命使人们挣脱了外在的锁链，而他的哲学则要把人们从“自在之物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说：“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①他试图通过他的《知识学》里那个顽强的不屈不挠的能动自我去向人类呼吁行动、改变世

^①《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

界。

费希特整个生活和著作充满了资产阶级革命理想。可是这种理想是在德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阶级上被接受的，因此这种理想在费希特那里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一种抽象的高超形式，正如它在德国古典人道主义、特别是在德国古典哲学里所典型地表现那样。鉴于同样的理由、他的社会思想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在费希特这里，这种理想并不完全停留在抽象思辨的领域，他要在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去实现这一理想，他不满足于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制度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他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靠他的劳动而生活”，^①“不劳动者不得食”。^②他看到贫困的问题，他把要求工作和面包的权利视作“理性王国”的主要任务，他从理性的国家观出发，强调“自己生活也让人生活”^③的原则，他力求国家能按照公民的劳动进行合理的分配，以清除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把康德的法权学说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④那么费希特的法权学说就意味着这一理论的最高发展，这就是说，它是1793年马拉、罗伯斯庇尔的激进雅各宾派革命专政的德国理论，同那些反对采取实际行动的思想家的英雄主义幻想比起来，费希特这种社会理想却带有更实际的特征，其回避现实的态度更少。

在谈到费希特的著作和哲学时，我们决不能忘记他的个性，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们将选择哪一种哲学，这就要看他是

^①《费希特全集》第3卷，第213页。

^②《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188页。

^③《费希特全集》第3卷，第402页。

^④马克思：《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101页。

哪一种人，因为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人们可以随意放弃或接受的死用具，反之一个哲学体系因占有这个哲学体系的人的精神而充满生气。一个天性萎缩的或是由于精神的奴役、博学的奢侈与虚荣弄得萎缩了和歪曲了的性格，将永远不能把自己提高到观念论的程度”。^① 费希特哲学不仅产生于他那时代正在发酵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且也依赖于他个人的性格，这种个性在他的著作里打下了不可忽视的烙印。因为他自己在无限制的活动追求中体验到外界上是一种对抗物，所以他在《知识学》里把意识的作用解释为无休止的活动，而把外在世界仅理解为达到活动目的的材料和场所。他的登峰造极的、直到君临一切的顽强固执的意志，曾经使海涅把他比做拿破仑，说他们两人“都代表着这个伟大的严酷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之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的。而他们两人各自构成的庞大建筑，表明了一个巨大的意志”，^② 这种比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费希特自己的要求，因为他自己就曾经虚幻地过高估计了纯粹思想的力量，试图以改变人们意识的办法去改造他的时代的社会状况，因此他的哲学命运就如同拿破仑帝国一样，最后也因这个意志的无限扩张而终于坍毁了。但是，正如海涅所指出的，“思想家们仍受到由费希特提出的思想的鼓舞，他的言论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即便全部先验唯心论是一种迷妄，在费希特的著作中仍然还有着一种高傲的独立性，一种对自由的爱，一种大丈夫气概，而这些，特别对于青年，是起着有益的影响的。费希特的自我和他那不屈不挠、顽强、钢铁一般的性格是相一

^① 引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3页。

^② 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9页。

致的。关于这样一个全能的自我的学说也许只能从这样一种性格中生长出来，而且这样一种性格生根在这样一个学说之中，必定会更加不屈不挠，更加顽强、更加象钢铁一般坚强。”^①

费希特后期在反抗拿破仑侵略战争中所表现的高度爱国主义行动可以说是这个更加不屈不挠、更加顽强、更加象钢铁一般坚强的个性的卓越例证。费希特本是热情赞扬法国革命，盼望法国民族有一天能取得最大优势，在欧洲实行彻底变革，但是，当拿破仑背叛了法国革命，将侵略的铁蹄踏进了德国的国土时，费希特立即以那同样火一般的爱国主义激情投入了反拿破仑战争的爱国宣传，他要以他的知识学来唤醒德意志民族的良心意识，更高地激发他们保卫祖国抗击外敌的爱国热情，他要用“一个最后的德国著述家那由正直心灵所支配的笔”，^②让每一个德国人认清敌人的侵略本质，认清正义和真理在我们这边，以鼓舞人们勇敢拿起武器去参加战斗。他甚至面对敌人的刀枪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畏惧地作了对德意志民族的爱国讲演，他说：假如我因演讲而死，则我的家庭、我的儿子则有了个为国殉难的父亲，倒也无上荣光。最后他也终于因长期劳累奔波而经不住传染病的袭击，在全欧反法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而慰然走完了他短暂而曲折的、多风波的人生旅程。

我们这里并不对什么进步的政治观点和反动的唯心哲学观点的矛盾作徒劳无益的讨论，对于费希特来说，一种真正的哲学就在于它是行动的指导，“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③本书试图通过费希特的个人经历

①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19页。

②《费希特书信选》，第265页。

③《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8页。

历史地重现费希特的观念，也就是说，通过费希特在人生途中所走过的旅程来表现他的哲学的意义，因为，正如恩格斯所教导的，“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感到骄傲的是：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而且也继承了康德、费希特与黑格尔。”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

内容提要

本书通过费希特那戏剧般的多风波的一生，表明了费希特在德意志民族文化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从而历史地重现了费希特的观念。作者以大量历史资料指明费希特的知识学是以法国革命所唤醒的那种对现存一切实行变革的火一般的行动渴望改造康德哲学的结果。费氏认为康德哲学的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性，他接过康德的理想，把自己的哲学真正变成一种行动哲学，因此他的哲学里充满了高昂的革命激情，在此基础上，费希特展开了他的哲学论辩。这样，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费希特的哲学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義。



作者介绍

洪汉鼎 1938年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于西方哲学史研究，曾发表过许多有关斯宾诺莎和分析哲学的研究论文。1983年由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去德国进修两年，其间用德文写出一部专著《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并与德国盖尔德撒策教授合编译《中国哲学辞典》两部，将在德国出版。1985年回国，现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工作。

特约编辑：顾杰珍

方 鸣

责任编辑：赵兴国

装帧设计：伍端端

封面图：甄明舒

目 录

引言	(1)
织带匠儿子的幸运	(1)
最初的精神激动	(6)
时代的观察者和批判者	(16)
“我不愿只是想，我一定要去干”	(25)
康德哲学的启示	(39)
拜谒康德	(50)
《一切天启批判试探》	(57)
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68)
呼吁行动——知识学灵魂	(80)
陷害、打击和“无神论风波”	(105)
知识学在继续发展	(124)
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	(140)

织带匠儿子的幸运

德国萨克森省上劳西兹区的拉曼劳村，有一户靠编织麻线带谋生的人家。1762年5月19日，这个家里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拉曼劳村位于比苏佛斯维塔镇和普尔尼兹镇之间。这里风景优美，有葱郁的树林，也有潺潺的流水，离这儿不远处就是迈森和劳西兹的边界。据费希特家人传说，费希特的曾祖父原是17世纪30年代战争时期瑞典的一名下级军官，跟随瑞典国王古斯道夫·阿尔多发打进德国，在拉曼劳村附近的一场不大的战斗中负了重伤，不得已离开部队，暂时逗留在这里。当地一位好心肠的路德教徒把他收留下并且精心看护他，在养伤期间，他渐渐地同这位恩人的女儿相爱了。伤势痊愈后，这位瑞典军官继续寄住在这里，再也没有返回部队，不久就同她结了婚。后来，老人的其他几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这样，这位瑞典军曹就以唯一的女婿兼儿子的身份继承了这家仅有的一小块田地，并且以费希特的姓氏在这里定居下来。拉曼劳村素来崇尚淳朴、仁厚和公正，他们一家的勤俭、刚毅和性格忠厚则尤其被人传为美德。

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的祖父就是这位留住在拉曼劳村的瑞典军曹的唯一后裔。他除了耕种祖传下来的小块田地外，还兼做编织麻线带生意。在当时德国封建割据的落后状态下，

资本的原始积累只能以分散零碎的手工业生产为主，农民兼做手工业生产乃是普遍现象。在国际市场上，德国商人除了拿出点农村手工业品，如纺织、花边、毛织物和麻织品去廉价出售外，根本拿不出别的。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的父亲克里士蒂安·费希特是这一家的大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附近的普尔尼兹镇去，跟一个富有的纺线商兼工厂主当学徒。老费希特当初希望，他的儿子除了要对这一行业有较好的知识和本领外，还能在这个城镇为自己的生意打开一个较大的门路，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克里士蒂安·费希特由于殷勤、忠厚和能干很快博得了师傅女儿的青睐，后来居然和这位厂主的女儿结了婚。如果我们了解当时德国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难知道他们的这种结合在当时一定是违反礼仪的结合。满身资产者傲气的富商鉴于这门婚姻并非门当户对，不允许他们在普尔尼兹镇居住，因此，这对小夫妇只得搬回拉曼劳村。克里士蒂安·费希特用他夫人的嫁妆在村里造了一所房屋，并在屋里安置了一台手工织带机，这样，经营麻线带生意就成了全家的生活主要来源。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是他们的大儿子，除他之外，这家还有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当时贫穷落后的德国，象这样十口人的大家庭，仅靠一点手工劳动为生，当然是贫困不堪的。费希特兄弟姐妹八人，经常是饥肠辘辘。海涅曾形象地说：“贫困之神坐在费希特的摇篮旁，把他摇大成人，这骨瘦棱棱的保姆一直是费希特的终身伴侣。”^①

从费希特后来的信札里谈到他的双亲的地方来看，他父母婚后的生活似乎不怎么幸福。他母亲显然染有那种小城镇中

^①参见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第120页。